

周建波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洋务
运动与
中国早期
现代化
思想



周建波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洋务运动与
中国早期
现代化
思想



周建波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洋务
运动与
中国早期
现代化
思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周建波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 1 (2004. 1 重印)
ISBN 7-209-02628-2

I. 洋... II. 周... III. 洋务运动-研究
IV. K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705 号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 周建波 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 250001)
<http://www.sd-book.com.cn>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页 220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2001—4000

ISBN 7-209-02628-2
K·390 定价: 18.00 元

序

赵 靖

周建波博士的新作《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是一本有深厚功底,又富有新意的好书,值得一读。

有关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研究,可以说是已经有百年历史的课题。其研究范围之周遍,参加研究人数之多,积累资料和研究成果之丰富,都极为可观。在这样丰厚的研究基础上,要想更上一层楼,使研究工作获得新的、较大的突破,是颇为不易的。为此,不仅要付出艰辛的努力,还要在研究方法方面有较大的创新。

周建波博士原攻中国近现代史,获得硕士学位后又从事教学工作数年,对近代史上的某些重要领域和重要问题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功底。后来,他转而攻读中国经济思想史,对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及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历史问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这使他在对洋务运动的研究中能够别开生面。本书着重把洋务运动及其各方面有关人物的思想和实践,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侧面来考察,就体现了这一点。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发展的問題就成为中国历史前进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发展的实质是要以社会化的现代生产力全面取代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个体农业、手工业的落后生产力,并为此改造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合的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发展是要使中国社会由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向一个现代化社会转化,所以发展的整个进程也

就表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切重大问题、事件和斗争,无不这样那样地同这一根本问题联系着,在各种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只有解决好了研究对象在这种联系中的定位问题,对研究对象的性质、特点、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评价。

周建波博士把洋务运动定位为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这种定位是确切的。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现代化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潮日益对社会发生影响,而且也作为一种实践日益展开。洋务运动以前,纵然有极少数人物开始在思想领域多少触及发展或现代化问题(如洪仁玕),但孤唱无和,不能形成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潮,这方面的实践就更谈不上了。因此,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在洋务运动以前中国尚无现代化运动,是不为过的。

在研究内容方面,本书着重研究洋务派的现代化方案,具体来说,也就是洋务派在微观上对经营企业的设想,在宏观上对发展现代经济各部门的设想。以往对洋务运动以及洋务派的研究多半未重视这一方面。本书主要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考察洋务运动,所以能把洋务派的现代化方案作为研究中心,这就不仅为研究工作开辟了新领域,而且对洋务运动的性质、失败原因以及历史地位这些长期以来研究甚多而且聚讼纷纭的问题也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见解。

由于本书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新尝试,新尝试就难免遇到某些新困难,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若干弱点和不成熟的地方。在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中,本书已取得的成就和突破,同它还存在的某些弱点和不成熟的地方,是同样宝贵的。相信作者会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方法研究历史问题方面,成为一位更成熟的、善于另辟蹊径的研究者。

前 言

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一直是近世学者研究的重点。最早对洋务运动进行历史考察的是康梁维新派,其后,学术界又在 20 世纪 30 年代、60 年代和 80 年代分别形成了三次比较大的研究高潮。由于不同时期政治、社会环境的不同,研究重点也不尽相同,但基本集中在以下五大问题上:一是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思想交锋,即中国近代史教材常讲的三次论战;二是洋务派大吏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和早期维新派郑观应、马建忠、王韬、郭嵩焘(这些人或则是洋务大吏的幕僚,或则是他们的朋友)等的思想分歧;三是对洋务运动纲领“中体西用”的评价;四是对官督商办企业的批判;五是洋务运动失败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关系。总之,以往的研究偏重对洋务运动兴起原因、性质、失败原因的探讨,而在洋务派如何设计国家现代化方案方面研究甚弱。具体来说,就是在微观上,不清楚洋务派如何搞好企业的设想;在宏观上,不清楚洋务派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各部门的设想。笔者认为,现代社会微观生产基础——企业制度建设至为重要,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建设好自己的微观生产基础,这个社会肯定是不稳固的。中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不正是为建设现代社会的微观生产基础而进行的努力吗?基于此,笔者认为,如果能从企业经营角度对洋务运动加以研究,无疑既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又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现代西方经

济学理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洋务运动加以研究。

在开始对洋务现代化思想研究以前,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说明。

一是洋务运动的结束时间。学术界将甲午战争作为洋务运动终止的时间,原因是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也有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晚清新政的兴起是洋务运动终止的时间。笔者持第二种看法。原因是,某种运动失败的标志和支持它的政策的结束不是一回事。甲午战争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却并不意味着洋务现代化政策的改变。甲午战争后,张之洞取代李鸿章成为洋务派后期的领袖,洋务运动继续进行。而且甲午战争的失败还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拯救中国,于是“中体西用”的声浪更大,影响之下,以致于康梁变法打的都是“中体西用”的旗号。不过甲午战后,洋务现代化政策确实有所转变: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日高,并由甲午战前的议论走向实际行动;二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官办工业政策逐步被商办工业政策代替。所有这一切,都为后来全面学习西方政策的出台打下了基础。

尽管这一时期学习西方的努力,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有一段时间的停滞,但庚子之乱再次将学习西方的要求,以更加猛烈的态势提了出来。面对亡国亡种的危机,洋务大吏张之洞、刘坤一改变了戊戌变法期间不谈立宪、不兴议院的立场,突破了《劝学篇》所设定的“中体”界限,要求全面学习西法。最高统治者也认识到,如果不学习西法,政权不亡于国内民众之手,也要亡于外国列强之手,再加上遏制洋务派的顽固派或被杀、或被贬,所以实行进一步改革的条件已成熟。于是遂有新政出台,其措施比起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总之,戊戌变法是改变洋务现代化政策的不成功尝试,新政才是清政府最高国策的转变。因此,笔者认为洋务运动的结束定在新政的出台比较合适。

二是洋务运动的参加者。过去研究洋务运动,往往把奕訢、文祥、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清政府大员视为洋务派;而把他们的幕僚、朋友及级别稍低一点的官员,如郭嵩焘、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视为早期维新派;至于其他从事洋务运动的人,如从事企业经营的企业家、从事新式教育的教育家等则略而不提。笔者认为,这种分类办法不利于反映洋务现代化运动的全貌。依笔者之见,当时凡是拥护“中体西用”原则,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积极从事洋务实践的人都属洋务运动的参加者,或者说都属洋务派的范畴。所谓洋务派,在运动的前期,主要与反对学习西方的顽固派相区别;在后期,主要与主张全面学习西法的维新派相区别。但考虑到学术传统的影响,故本书一概称他们为洋务运动的参加者。当然,洋务运动的参加者内部也存在思想上的分歧,为便于识别和研究的方便,本书将曾、李、左、张等人称为洋务大吏或洋务派大吏,他们是这一运动的领袖和庇护者;将郭、王、薛、郑、马等人称为洋务思想家或洋务派思想家,他们是这一运动的鼓吹者、实践者和批评者;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洋务运动参加者,包括企业家、教育家、官员等,则称他们为一般洋务派人士,洋务思想家是他们的代言人。

关于本书的写法,有必要强调一下。一般来讲,能反映一个人或一个派别思想的材料,主要是看他(他们)如何说,其次是看他(他们)如何做。对洋务运动的参加者来说,一方面有较高文化水平的洋务大吏及其幕僚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材料,这是我们研究洋务现代化的重要史料;另一方面,许多从事企业工作的人由于工作本身及文化水平的限制,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字材料,这样要研究洋务现代化思想,特别是研究洋务派企业经营思想,只能依据当时企业的史料。本书在写作企业经营篇的时候,大量运用了有关企业的史料,在此特作说明。

关于本书的创新之处,笔者自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

方法上的创新,将企业经营作为洋务现代化的研究对象,这在过去不曾出现过。第二,史料运用上的创新,使用了不少过去未用过的材料,研究企业经营思想时,表现得尤为突出。第三,观点上的创新。如提出洋务大吏的幕府在洋务现代化过程中既起了人才储备库的作用,又起了推动洋务大业进行的行政机构的作用。再如,文章探讨了洋务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思想,指出从总体上讲是建立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新式工业体系,而在民用企业的发展上则是“出口替代”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思想。

目 录

序.....	赵 靖(1)
前 言.....	(1)
第一篇 绪论篇.....	(1)
第一章 时代变局与洋务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1)
一、清中央政府内部奕訢集团的胜利	(2)
二、地方督抚系统湘、淮军集团的崛起.....	(6)
三、“自强之言”与洋务现代化思想的提出.....	(12)
四、洋务运动的参加者.....	(15)
第二章 洋务现代化的纲领	(19)
一、“外须和戎”:改革的前提条件	(20)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内改革的原则.....	(22)
第三章 洋务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29)
一、建立军事工业体系	(29)
二、“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相结合的民用工业 发展战略	(36)
第四章 洋务派的社会改革思想	(41)
一、洋务大吏的政权改革思想.....	(42)
二、洋务派思想家的政权改革思想.....	(46)
三、伦理建设思想.....	(53)
第二篇 企业经营篇	(59)
第一章 筹集资本思想	(59)

2 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

一、整顿传统税收	(60)
二、征取新式工商税	(70)
三、吸引外国资本	(78)
第二章 改进技术思想	(85)
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	(85)
二、培养国内技术人才	(90)
第三章 培养企业经营人才思想	(97)
一、官办企业(包括官督商办企业)企业家的 选择	(98)
二、商办企业企业家的选择	(105)
三、政府在扶持企业家成长中的作用	(112)
四、提高企业家的经营能力	(114)
第四章 雇佣自由劳动力思想	(119)
一、工人的来源	(119)
二、招雇工人的标准	(121)
三、工人工资的制定	(124)
四、劳工管理	(128)
第五章 企业经营管理思想	(131)
一、科学决策	(131)
二、人事管理	(134)
三、财务管理	(136)
四、运用现代管理手段	(138)
五、营销管理	(141)
第六章 企业组织制度建设思想	(147)
一、在中国建立股份公司思想	(148)
二、企业商办思想	(156)
三、官办军、民用企业的改革思想及实践	(162)
四、官督商办企业的改革思想及实践	(166)

五、官督商办企业的评价	(177)
第三篇 国民经济篇	(183)
第一章 发展现代农业思想	(183)
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	(184)
二、以西法发展现代农业	(187)
三、重视水利思想	(191)
第二章 发展现代工业思想	(192)
一、发展现代矿冶业思想	(193)
二、制造业的发展	(202)
第三章 发展现代商业思想	(207)
一、对外通商思想的确立	(207)
二、发展现代商业的方法	(211)
第四章 发展交通、通讯思想	(215)
一、发展陆路交通思想	(215)
二、发展水路交通思想	(223)
三、发展通讯业思想	(225)
第五章 发展现代金融思想	(228)
一、铸币思想	(228)
二、发行纸币思想	(231)
三、银行建设思想	(233)
第六章 转移农业社会过剩劳动力思想	(237)
一、机器生产是转移过剩劳动人口的根本途径	(237)
二、转移农业社会中非生产部门过剩人口的 考虑	(242)
第四篇 结语篇	(248)
第一章 洋务现代化思想的渊源	(248)
一、经世致用思潮对洋务现代化思想的影响	(248)

二、传统经济思想与企业的“官办”与“商办” 之争	(256)
三、在华西人与洋务现代化思想的形成、发展	(259)
第二章 洋务现代化思想的评价	(271)
一、对现代经济认识的深入	(271)
二、洋务现代化思想为维新思潮取代的必然性	(276)
第三章 清政府与洋务现代化	(279)
一、清政府对洋务现代化的支持	(279)
二、清政府无力承担领导中国现代化的使命	(282)
三、清政府无力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286)
主要参考文献	(289)
后 记	(298)

第一篇 绪论篇

洋务运动,也称“自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改革运动,目的是通过学习西方(最初瞩目于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吸收,后逐步深入到政治、文教和社会伦理等方面)增强国力,以巩固清政府的统治。然要领导这么一个持续几十年、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改革运动,必须有一个立意变革的领导集团,一套推动变革的领导机构,一个能够凝聚人心的纲领口号,和一套实施变革的战略规划。同时,经济领域的变革必定要对社会的政治、伦理产生影响,从而产生出与经济变革相配套的政治、文教和社会伦理变革思想。本篇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以求在研究洋务派企业建设思想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思想之前,能够对洋务现代化思想有一个总体把握。

第一章 时代变局与洋务现代化思想的形成

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从观念传播到现实的行动,其基本前提是具有现代趋向的现代精英取得领导地位^①。究其缘由,乃在于这些国家是在缺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下为着民族命运而被迫进行的选择。于是逻辑的

① 富永健一:《社会学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也是现实的情况是：首先在大多数人还不能用世界眼光看待自己历史处境的情况下，它只可能是那些对民族命运承担责任的上层社会的自觉；其次，在整个社会远未自觉的情况下，它只能是由社会上层强迫整个民族接受的现代化拯救；再次，在传统力量空前强大的情况下，它必须依赖现代化权力精英以有力的人为干预方式强行输入和扶持；最后，在民间社会力量微弱分散的情况下，它只能是由具有现代趋向的政治领导来承担驱动者和主要推进者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过程中，1860年具有特殊的意义。通过这一时间坐标与一系列历史事件，一个立意进行变革的领导集团，一个推行变革的领导机构，以及一个动员变革的纲领口号崛起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构成洋务现代化启动的基本环节。

一、清中央政府内部奕訢集团的胜利

1860年8月，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北逃，临行授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等“督办和局”。奕訢本来和官僚士大夫中的其他人一样鄙弃西方，并相信只要朝廷主战“实可制其死命”。但在和西方人交际周旋的过程中，他发现西方人并不是野蛮不开化，而是温文尔雅，颇有礼貌；不是“夷性狡黠”，“要求无厌”，而是重视契约，“所请尚以条约有据”^①。根据他对西方的新认识，他要求清政府改变自古以来“非战即抚”的传统方针，对西方国家“以诚相待”，“真心和好”，通过外交上的努力，消除或减轻西方的侵略或威胁。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就是他的这种思想指导的结果。奕訢对西方的开明姿态与端华、肃顺等的强硬排外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西方人因此热切希望

^①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69，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82页。

奕訢上台并对稍后发生的“辛酉政变”发出欢呼。在中国与外界已经有密切联系的情况下,西方势力的支持是各派政治力量较量的重要砝码,奕訢首得这一分,地位因而大大提高。另外,由于奕訢“不开边衅,未失国体”地解决了中西冲突,被朝野上下誉为“磐石之宗,血脉之臣”,“声望压端华、肃顺”^①,从而为粉碎肃顺集团奠定了基础。

在办理抚局中大获成功的奕訢在收获了声望和荣誉的同时,还收获了政治实力。他将留守在北京的文武官员集合于周围,形成以他为领袖的政治集团。在这一集团中,有受到肃顺集团排斥打击的周祖培、翁心存等文武大臣,更有与他政见一致的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满汉大员沈兆霖、宝筠等人。他们和奕訢一样,在与西方人的周旋交际中,传统的观念和视野发生改变。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战前积极主战,《北京条约》签订后,言论为之一变,认为西人“以万余众人城而仍换约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②。奕訢最得力的助手文祥思想走得更远,《清史稿·文祥传》中保存了他的一段话:“说者谓各国性近犬羊,未知政治,然其国中偶有动作,必有其国主付上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卿士也;付下议院议之,所谓谋及庶人也。议之可行则行,否可止。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比照中国国情,文祥指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③。“势有难行”是对现实的感慨,“义可采取”则蕴涵着变革的意向。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初三日,即《北京条约》签订两个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卷2,第146页。

②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1辑第1分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台北)1972年出版,第743页。

③ 《清史稿》卷386,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691页。